

■周一有约

文·春拉 李鹏

“我的童年很简单,因为我基本就是在农村长大。从小我就是想上学,哪怕请假1天,我都会觉得好像在家里待上了7天。”西藏农牧科学院农业研究所研究员尼玛卓玛回忆说。

尼玛卓玛,藏语意为“太阳仙女”。作为如今西藏农业研究领域的一名领军人物,一名屡获表彰的优秀农业科技工作者,走进校园去学习知识,曾是她最大的梦想。村小学、县中学、县高中……受惠于国家教育援藏政策,尼玛卓玛幸运地一步步实现了自己的梦想,在1985年顺利从西北农业大学农学系毕业。

30余年如一日地奔波在西藏各地的田间地头开展油菜新品种选育项目,与农民一起耕地、播种,虽然没有鲜花与掌声,但尼玛卓玛的执着与努力换来了广大老百姓的增产增收。2012年尼玛卓玛被评为“十佳全国优秀科技工作者”“全国优秀科技工作者。”

破茧而出的高山雪莲

“作为一名科技人员,我一直想的就是怎样能解决农民的困难,怎样把西藏农业科技水平提升上去,让西藏的农业发展与国内同步,这是我为之奋斗的目标。”尼玛卓玛说。

1985年,也就是尼玛卓玛毕业的那一年,国家开始对西藏农牧民子女接受教育实施“三包”(包吃、包穿、包学费)政策;也就是在那一年,国家正式落实“在内地省市办学,帮助西藏培养人才”的重大决策,开启了每年招收1300名西藏少数民族小学毕业生到内地19个省市西藏班和西藏中学学习的教育新篇章。

随后的30余年里,国家不仅连续14次提高“三包”标准,在内地21个省市开办了137个内地西藏班和内地中职班,同时还实施了“春蕾计划”、学生营养改善计划、15年免费教育等一系列教育优惠政策。全方位的教育保障,不仅极大地激励了农牧民子女就学热情,也越来越像

尼玛卓玛一样渴望知识的藏族女孩得到了学习机会。

统计数据 displays,截至2015年底,西藏全区各级各类学校达1855所,教学点322个,在校学生数超过60万人,其中女生数量已达在校总人数的50%左右。

然而,这对于65年前的西藏普通百姓,特别是藏族女性而言是根本无法想象的事情。

在旧西藏,人分成三等九级,明确规定人们在法律上的地位不平等。其中,女性被列为低等级,尤其是那些处于社会底层的贫苦妇女,其身价仅为草绳一根。数据显示,旧西藏95%以上妇女处于文盲状态。

作为西藏女性问题的专家学者,西藏自治区社科院研究员仓决卓玛指出,西藏自和平解放,特别是民主改革以来,建立起来的一整套保护妇女权益和促进男女平等的政策法规

律,不仅让西藏妇女的地位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同时还赋予了她们与男子平等的权利,这从侧面展现了西藏社会的发展和文明取得巨大进步。

亲手发出第一份电报的藏族女电报员次仁、第一位女藏医强巴卓嘎、第一位女证券交易员次仁卓玛、第一位藏族女教授次仁央宗、第一位女律师央金、第一位世界级摔跤冠军西洛卓玛……西藏和平解放65年来,像尼玛卓玛一样,一批又一批雪域高原的优秀妇女凭借着自身的勤劳智慧与崇高理想为西藏的跨越式发展与长治久安作出了重要贡献。

据统计,目前西藏妇女总人口为153.21万人,占全自治区人口的49.1%;西藏自治区十届人大女代表、十届政协委员分别占总数的23.2%、21.2%,西藏自治区女性公务员占公务员总数的33.8%。(据新华社)

■人物点击

施密特:用的是苹果手机

一般而言,公司高管会公开使用自己公司的产品,尤其是应该避开竞争对手的产品,尽管很多时候事实并非是这样。日前,谷歌母公司Alphabet的主席埃里克·施密特透露,自己现在同时使用两款手机,分别是iPhone 6s以及三星Galaxy S7。

这并不是施密特第一次被曝出使用苹果手机。今年3月,谷歌人工智能系统AlphaGo与韩国职业围棋棋手李世石九段的人机大战在韩国举行,施密特在出席赛前发布会时,就被韩国媒体拍到使用iPhone拍照。

照片一经发布,便引起了网友的热议,不少网友认为作为谷歌母公司Alphabet的高管,施密特不用Android设备而用iPhone的行为,会让人觉得他更喜欢苹果的iOS系统。

此次施密特力挺三星Galaxy S7,似乎证明了他还是更喜欢Android系统,但是相比施密特使用苹果手机这件事情,更让人惊讶的是,施密特使用的Android设备是三星,而不是谷歌自己的产品Nexus。施密特为三星Galaxy S7点赞,还有很大一部分原因是三星与谷歌的合作伙伴关系。

当然施密特并不是硅谷唯一使用别家公司品牌产品的人,微软手机副总裁也曾被曝在旅行中使用iPhone,不过他认为这样有助于熟悉竞争对手,在更深层面理解移动生态系统。

程维:精力向技术研发集中

在刚刚结束的中国第二届大数据产业峰会上,滴滴出行董事长兼CEO程维表示,和专车市场早期的补贴大战相比,滴滴现在把更多精力投入到技术的研发上,比如通过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更多地去了解用户的需求,提升产品体验。无论乘客还是司机,今年都有一个比较明显的感觉,滴滴正在减少补贴力度,滴滴快车也相应提价。尽管没有了以往的大力度补贴,滴滴的规模依然在增长,最新数据显示,5月20日滴滴平台上的快车日成交订单总数已经突破一千万。

“初步的市场教育已经到了一个阶段,今年以来补贴不是我们最重心的事情,你们或许已经感觉到,我们确实是在大数据、技术上投入了很多的精力和注意力。”程维说。

比如对于用户来说,平台可以为其推荐目的地,避免司机绕路;对司机端来说,平台可以为其分派合适的订单。这个场景实现的背后,即是滴滴在不断投入打造的人工智能引擎。

大数据的应用还体现在用车安全上。随着大量车主不断加入,平台对司机的监管变得复杂起来,稍有疏漏就有可能导致不良事件的发生。这种分享模式必然需要提高整个社会的诚信体系才有可能诞生,程维坦言,对于平台而言,拥有一套完备的安全体系非常重要。目前,滴滴正在和阿里、腾讯以及一些主管部门打通数据,从多个维度的数据了解司机的行为,以及随着时间的变化这些行为是否会发生转变。

伍军:注重科技工作者利益表达

在新时期下如何畅通诉求表达渠道,构建更加完善的利益表达平台体系,解决科技工作者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

在京参加全国科技大会的中国中铁四局总工程师、副总经理伍军表示,运用现代信息技术倾听呼声。随着信息化的发展,构建与科技工作者信息交流的各种信息化平台,如运用MSN、BBS论坛、QQ群、微信等。“作为现在现有的网络平台,我们缺乏网络的沟通方式和诉求窗口,仅仅限于新闻、报道、文章的查看和传阅,对外宣传的力度大,解决内部问题的窗口少,所以需要与会员进行坦诚的思想交流、热点讨论,关注他们的各类问题,才能有效增强会员的凝聚力,形成上下共谋发展的良好格局。”伍军说。

而在搭建多层次沟通平台双向交流方面,伍军认为可以在法律法规和政策规定框架下,更加广泛地建立各种会员合法利益诉求表达渠道和载体,如主席信箱、谈心室、定期与不定期对话机制等,使广大科技工作者能够畅所欲言,并使其合法利益诉求能够在科协的各项决策中。

经常深入了解意愿也非常重要。“条件好了,是不是高科技工作者‘运’了?问题‘少’了,是不是不研究新问题?科技工作者在想什么、盼什么、需要什么,了解了多少?”对于这样的重要问题,伍军强调需要经常思考和讨论,建立起切实有效的制度。这样才能完善国有企业科技工作者激励措施,激活国有企业科技工作者队伍所蕴含的创新潜能,从而推动企业真正成为技术创新的“主战场”。

而在搭建多层次沟通平台双向交流方面,伍军认为可以在法律法规和政策规定框架下,更加广泛地建立各种会员合法利益诉求表达渠道和载体,如主席信箱、谈心室、定期与不定期对话机制等,使广大科技工作者能够畅所欲言,并使其合法利益诉求能够在科协的各项决策中。

我们期待在未来,“颜值”提升的不仅仅是一张小小的身份证照片。(据新华社)



朱兆云:“云药”创新耕耘者

文·本报记者 马波



5月18日,滇池畔的空气格外清爽。记者总算见到了朱兆云这位大忙人。

知道她,是因为她和她的团队,在低纬高原地区少数民族传统用药经验发掘抢救、天然药物资源系统调研、重要药物资源合理规划以及彝医药新药创制方面取得了大量基础性、创新性和公益性成果。她和团队荣获了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个人被授予中医药学术发展特别贡献奖、获何梁何利基金“科学与技术创新奖”,成为全国优秀科技工作者、全国劳动模范。

佩服她,是因为其项目组踏遍了云岭数万平方公里的崇山峻岭、高原草甸、河流峡谷,行程近80万公里。

写她,是为当初她义无反顾去云南省药物研究所的那份勇气和情怀。

谁都知道,那是个“火坑”

1999年,朱兆云45岁,时任云南省医药工业公司管技术的副总经理。领导找她谈话,希望她到云南省药物研究所当所长。谁都知道,那是个“火坑”:一是面临转制,二没钱没人。或许是考虑让她去收拾这个烂摊子太难,让她有条后路,领导对她讲“你的人事关系可以不转,保留在医药公司。”朱兆云却回答:“既然人去了,人事关系在这里算怎么回事,也转!”朱兆云后来回忆说,当时很多人劝我,说都那么

大岁数了,安安稳稳地,干嘛去跳“火坑!”我其实没有想那么多,领导找谈话,就是信任你,而我就觉得是责任!

知道云南省药物研究所惨淡度日,但当朱兆云走进所里时,朱兆云的心还是凉透了:茅草有人那么高,办公室空无一人,满目蜘蛛网,打开办公桌居然有老鼠跳出来。

当晚朱兆云失眠了。她说,我倒不是后悔,而是着急,想该从哪里着手改变呢?

将祖传的用药经验贡献出来

临危上任的朱兆云没有时间后悔。她面临的困境很具体:所里账面上时只有10万元,职工对前途没有信心,无人上班。失去国家财政供养的科研院所该如何生存?她反复思考:一个1956年由国家建立起来的天然药物研究所,曾诞生过全国第一个抗高血压新药降压灵,曾开出三七系列新药,灯盏花系列新药,曾参与提取出抗疟新成分青蒿素,这样一个有着辉煌成就和传统的天然药物研究所,不能从此沉沦,而是必须重生。

朱兆云很快理出了思路,新领导班子统一了认识:要生存必须科研和成果转化两条腿走路。然而,没有当家新药,没有像样的实验室、科研人员寥寥星星,一无所有的药物所该如何迈开腿?

“当务之急是要开展科研,拿出新药来。”可谈何容易?

此时的朱兆云,又做出了一个更加让人和朋友吃惊的决定:将家族中祖传的独特用药经验贡献出来,创新攻关。

“金品”让药物所实现自救

朱兆云,1954年3月出生于大理白族自治州巍山彝族回族自治县的一个中医世家。怀揣着子承父业的中医梦想,她如愿考上了云南省中

学院。虽没能如父亲一般穿上白大褂为人诊脉,但分配在大理州制药厂的她,30岁就组织完成了大理州中药资源普查,成为全国的典型。

■第二看台

身份证“颜值”提升的背后

文·陈子夏 赖星

在人人爱自拍、爱美图的今天,身份证照片是一些人的“黑历史”。不仅如此,人们往往还要特地抽出时间,多头奔走,才能得到这张印着“丑到没朋友”照片的证件。而在江西,创新性的“一站式”身份证办理系统正逐渐开始化解人们办证难、照片“丑”的双重尴尬。

在江西省上饶市人流量最大的人民广场商圈,一座通体蓝色,周身环绕着动态LED显示屏的警务站,在人潮中格外亮眼。

29岁的龚静走进警务站,坐上一台自助拍照机前。

“按下右手边的拍照按钮就能‘自拍’。如果不满意可以取消进行重拍,拍几次都可以。”一旁的执勤民警邱慧婷向龚静介绍。

龚静望向镜头,按下拍照按钮,一张标准证件照就显示在屏幕上。在几番“挑剔”后,她按下确定键,一张身份证照片正式生成。

随后,龚静到一旁的自助申领机录入了身份证号、指纹等个人基本信息,并使用手机扫码完成了办理费用的支付。在她一旁的市民张磊,则刚通过自助领证机取到了自己30天前补办的新身份证。

“办身份证再也不用来回折腾了。”张磊回忆,过去补办身份证要专门请假,还要在照相馆和派出所之间“两头跑”,前后少说也得花上两三天。

“手机付费很方便。更重要的是,我的照片可以让我自己来做主了!”龚静说。

人民广场合成警务站站长徐伟介绍,这套“一站式”身份证自助办理系统自今年2月“上岗”以来,共服务群众办理身份证1400余人次。

“除了这套系统,警务站还实行‘三班三运转’模式,保证执勤民警24小时无缝对接。机器和人一起全天候服务群众,有效解决上班族、学生族等群体无法在正常上班时间办理身份证业务的难题。”徐伟说。

朱晓榕是江西科泰华软件有限公司的董事长,江西上饶市的身份证自助办理设备就是其研发团队成果。

2014年,朱晓榕到内蒙古、上海等地出差,看到民警为给居民办理身份证,连上厕所时间都没有,还常常推迟下班时间。他由此萌生了一个想法:研发出既方便群众办事,又能缓解民警紧张工作的设备。

“取钱能有24小时ATM机,为什么办证就不能?”于是,他开始到深圳招募技术人员,组建团队,进行研发。

期间,南昌市公安局高新派出所参与了系统中自助领证机的部分研发和测试工作。“在试用过程中不免出现问题,一些办证市民也因此有所抱怨。”朱晓榕说,“但高新派出所坚持把这项创新做好,配合、帮助我们调试,直到成品问世。”

经过16个月的努力,这套集合了拍照、申领、

领取功能的设备在2015年9月下线。高新派出所将曾经出过小故障、如今工作“麻溜”的第一台机器留在了办证大厅,而上饶市公安局信州分局则引进了从照相到申领,再到最终领取的第一套完整系统。

目前,这套设备已经推广到浙江、湖北、湖南、重庆等14个省份。

目前,各地都在探索改进政务服务。但困扰基层群众的“办证多、办事难”现象仍然大量存在,造成群众重复提交办事材料、往返跑腿,给群众办事创业带来诸多不便。

南昌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院长廖晓明认为,要打破数据的部门壁垒,互通互用,加快推进部门间信息共享和业务协同,简化群众办事环节,提升政府行政效能。

我们期待在未来,“颜值”提升的不仅仅是一张小小的身份证照片。(据新华社)